

在歷史的投影

范泓 著

在歷史的投影中

范泓

著

在歷史的投影中 / 范泓著.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08 .10
面；公分（史地傳記類；PC0055）

BOD 版

ISBN 978-986-221-087-1(平裝)

1. 知識份子 2. 傳記 3. 中國

782.248

97018027



史地傳記類 PC0055

在歷史的投影中

作 者 / 范 泓

主 編 / 蔡登山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賴敬暉

圖文排版 / 郭雅雯

封面設計 / 蔣緒慧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8 年 10 月 BOD 一版

定價：42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8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目次

王雲五與「金圓券風潮」	1
束雲章其人與事	15
「五四後期人物」殷海光	27
羅家倫與《新潮》雜誌	37
在「民主與獨裁」中的胡適	45
陶希聖眼中的胡適	59
胡適先生簽名本——《師門五年記》及其他	71
胡適為何屈就東方圖書館館長	83
胡適為馬之驥證婚	95
也說胡適一段情	101
朱養民先生	107
蔣廷黻這個人	115
《獨立評論》中陶希聖	121
《梅隱雜文》中舊人舊事	131
雷案背後	139
兩個浙江人	151
高宗武與他的未刊回憶錄	159
一個時代的一群人與一本雜誌	179



四十年前的「中西文化論戰」——《文星》雜誌與一樁訴訟	221
蕭孟能晚年的悲情.....	251
蘇雪林論魯迅.....	263
泰山無字碑	277
不妨風雅更清狂——從吳保初說開去.....	287
有些事大可不必	295
打量文明的生死結.....	301
崇拜的權力在大多數	309
格瓦拉不可能活在今天.....	315
不忘自由，才能體驗自由	325
林昭之死與我們這代人.....	331
在歷史的投影中打撈智慧（代後記）	337

王雲五與「金圓券風潮」

一

1948年7月29日，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見行政院院長翁文灝、外交部部長王世杰、財政部部長王雲五、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財政部政務次長徐柏園、中央銀行副總裁劉攻芸、臺灣省財政廳長兼美援會聯絡人嚴靜波（家淦）等人，商討幣制改革案。

這一行人從南京乘專機至杭州，再經由京杭國道，到武康縣（今德清縣）三橋阜，換乘肩輿上山。從三橋阜到山頂的公路，抗戰時就已被毀，尚未修復，登山就要坐轎子，一路之簸搖，想必不是一件愜意的事。其間，發生過這樣一個小插曲：翁文灝等人三橋阜下車，守候在路旁的轎夫，衝著身材矮瘦的翁文灝一擁而上，竟無一人理會王雲五，據說是過於肥胖，「轎夫不願高抬」。這件趣事，是當時甫卸浙江省政府委員、民政廳廳長職務的阮毅成後來在一篇有關王雲五的文章中披露的。說起來，自是朋友間的相與笑樂，但轎夫們這種「不願高抬」的現實心理，對於這次力主幣制改革的王雲五來說，或可成為接下來發生「金圓券風潮」最好的注腳：民眾切身利益絕不容忽視，任何改革，都不可重苦國民。



這時的中國，經歷八年抗戰之後，生命財產毀損難以計數。作為執政的國民黨，理應給剛剛擺脫戰亂之苦的中國人，以一個恢復正常生活秩序、發展經濟、休養生息的機會。不料，戰後僅十個月，內戰即全面爆發，一打就是三年多。美國政府派來剛獲准退休僅十天的馬歇爾將軍居間調停，中共所堅持的底線是，反對「一黨獨大」，和談之外，以武力抗爭；國民黨不願放棄執政優勢，則希望在局勢稍加穩定、全國性的危機爆發之前，能夠迅速解決中共問題。

當時雙方兵力和地盤，國民黨占絕對優勢；但隨著戰後經濟不斷惡化，以及接收措施喪失民心，形勢此消彼長，國民黨的頹勢正逐漸明顯起來，這不止反映在政治層面上，經濟和金融等問題處理得也是一團糟。以淪陷區為例，抗戰結束後，政府一紙命令規定：不准使用偽銀行貨幣（中儲券、聯銀券等），偽幣二百元對一兌換法幣。如此變易，意味著淪陷區數億民眾的動產價值，一夜之間，變成了只有二百分之一。不到八個月，南京城裏最基本的生活物資，如稻米，暴漲五百倍之多！從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自 1947 年 9 月下旬給馬歇爾的內部報告中亦可知道：「到 8 月底，通貨比 5 月底膨脹了 64%，比去年初膨脹了 27%。1947 年的頭五個月一直維持著這樣高的通貨膨脹率，從年初始，預算赤字與通貨膨脹幾乎同步上升。……政府處境繼續惡化，行政上仍舊無能，這仍屬於基本趨勢。現在，中央政府猶如病入膏肓的病人，衰弱不堪。」（《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 年 7 月版）

二

1948年6月，前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就任行憲後的第一任財政部長。為挽救此時瀕於崩潰的經濟，提出幣制改革案，以「金圓券」代替業已崩潰的法幣，限制物價暴漲（即以行政辦法平抑物價）。在王雲五看來，「只有改革幣制，才能挽救財政經濟日趨惡化的局勢」（王雲五《岫廬八十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這一想法，早在一年前就有了。

這裏有必要談一談「法幣」。

民國以降至抗戰爆發這段時期，中國財政與金融可用一個「亂」字來形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幣值制度尚無法確立，金融界資本家、軍閥與錢莊各自發行貨幣，單其硬幣就數十種之多。二次北伐後，蔣介石形式上統一了中國，由於仍無法統一貨幣，距真正的「國家統一」還有一段距離。1929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克麥拉應邀來華協助推動金本位制貨幣改革，未果；1933年，國民政府引進銀本位制，即有名的「廢兩改元」政策，並開始鑄造銀幣。此時正值世界性經濟大恐慌，西方各國相繼脫離金本位制，改採以國家信用或政治力為基礎的通貨管理制度，到了1935年，美國政府大量收購世界銀元，致使國際市場銀價暴漲。中國民眾也大賣銀元換取美金，造成國內銀元大量流向美國，銀本位制搖搖欲墜。此時英國政府看准中國幣制即將崩潰，便打算積極介入，取得對新幣制掌控。為此，英國政府派出大師級金融專家李斯·羅思前往中國，指導進行幣制改革。1935年11月4日，國民政府宣佈將銀元國有化、停止以銀元兌換銀行券的措施，所有通貨改成政府指定的紙幣，這就是所謂的「法幣」，即法定通貨。



法幣發行之初，對穩定和推動戰時中國經濟起到積極作用。「過去從來沒有人相信中國能完成財政改革，統一貨幣，但蔣介石在英美大力協助下手術成功、穩住了陣腳」。不過，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亦極為深刻，「在這場豪賭之中，英國方面總共借款中國一千萬英鎊之多。……這也造成了中國在財政甚至外交上依賴英美的局面」（黃文雄著《日中戰爭》，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6月初版）。中日開戰的1937年，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總額推定為14億元；八年之後，就是抗戰結束那年，發行總額卻高達5569億元，暴增約400倍，通貨膨脹嚴重可想而知。

如果說法幣已漸成中國主流通貨，抗戰爆發後，實際上還有一場不見硝煙的「通貨攻防戰」。如日本人於1937年11月登陸杭州灣，即刻發行「軍用票」，其目的是貶低法幣值（後強制擴大至佔領區）；次年三月，日本人更處心積慮地協調華北聯合準備銀行發行「聯銀券」；共產黨八路軍在晉察冀邊區發行「邊區券」；汪兆銘「南京政府」成立後，則於1941年1月6日由中央儲備銀行發行「儲備券」（中儲券）。如此等等，「這場通貨戰爭競爭的不只是通貨的健全性、信用與流通性，其中也少不了製造讓對手經濟混亂的『假鈔戰爭』」。

抗戰結束不久，國共雙方重新開打。國民黨方面，由於軍費大增，財政惡化，大量印刷法幣，造成通貨膨脹，刺激物價上漲，財政赤字增加，至1948年8月19日金圓券發行前，法幣發行額增至660萬億元，比抗戰前夕增加了40餘萬倍，物價較抗戰前上漲了3492萬倍；此暴漲局面，反過來又導致加速法幣的流通速度和貶值速度。作家茅盾在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中這樣說：「當

時流行著這樣的笑談：『在中國唯一仍然在全力開動的工業是印刷鈔票』。」

宋子文內閣（1945 年 5 月）、張群內閣（1947 年 4 月）均採取過應急措施，前者以拋售黃金平抑物價，「雖略收效於一時，終久亦告失敗」（王雲五語）；後者提出一個「經濟自助十年計畫」，即控制物價、穩定幣制、清理稅則、恢復生產等；然龐大軍費開支，最終未能抑止法幣瘋狂發行和貶值。針對米價上漲，中共與民盟共同發起「反饑餓、反內戰」運動（國民黨稱之為「吃光運動」），儘管行政院宣佈調整大學生副食費，卻未能抑止此全國性的「反饑餓運動」。

早在抗戰後期，蔣介石即曾多次邀請王雲五參加政府工作，「以貢獻其多年注重科學管理之經驗於戰時經濟」（吳相湘語），王以商務印書館一時無相當人選可資接替，婉言謝絕。抗戰後，蔣舊意重提，王仍願以在野從旁協助，不願入閣。1946 年 4 月，王雲五自重慶東下上海，蔣託王世杰赴滬堅邀，才有所鬆口。5 月 5 日，國民政府正式還都南京，蔣即任命王為經濟部長。任職約有一年，在若干計畫或步驟，與行政院長宋子文見解不和，曾三度辭職。這一次，之所以出任行憲後的第一任財政部長，「唯一的誘惑使我勉允擔任此職，就是對於改革幣制之憧憬……」

王雲五親擬「幣制改革平抑物價平衡國內與國際收支聯合方案」，其中第一條就是：採行管理金本位制，於最短期內發行新幣。此案與翁文灝交換意見後，次日特謁蔣介石，蔣「原則上表示贊同」（王雲五語），但為慎重起見，又指定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及三位專家協助翁、王二人詳加研究，並草擬各有關辦法，由此有了一個「六人小組」。從 7 月 9 日至 28 日，整整二十天，三十幾

條原則，「經六人小組多次秘密討論」，並予修正後，由王雲五進一步草擬具體辦法。此修正案原本擬交 7 月底立法院休會前提請通過，蔣介石認為「時間或來不及」，且公佈前須「絕對保密」，故未再提交立法院討論。於是就有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7 月 29 日，翁文灝、王世杰、王雲五、俞鴻鈞等人從南京趕赴莫干山，與蔣會面，共商幣制改革案。

三

為保密起見，這一行人返回南京途經杭州時，未看望任何人。

1948 年 8 月 19 日，正式頒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公佈《金圓券發行辦法》、《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資產登記管理辦法》、《整頓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等四種法規。

- 一、《金圓券發行辦法》：規定以金圓為本位幣，法幣及東北流通券均停止流通。法幣三百萬元，換金圓一元，東北流通券三十萬元換金圓一元。金圓之法定含金量為 0.22217 公分，採十足準備制。金圓券發行總額以二十億元為限。對美金匯率，為金圓券四元合美金一元。
- 二、《人民所有金銀及外幣處理辦法》：公佈黃金白銀及外國幣券國有政策，人民持有之金銀外幣，應於 9 月 30 日以前，持向當地中央銀行兌換金圓券。
- 三、《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資產登記管理辦法》：限令國人在國外存放款項，必需向政府登記，以便管理。

四、《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加強管制經濟，凍結物價，限定全國物品及勞務價格，按 8 月 19 日標準，折成金圓券出售，不得變動。

公佈之前夜，各種文件起草與謄正，均由王雲五一人辦理，「不肯假他人之手」。公佈第二天，行政院長翁文灝發表談話，說明經濟緊急措施意義。8 月 21 日，蔣介石通電各省市府，曉示政府改革幣制、穩定經濟決心，並派出俞鴻鈞、蔣經國、張厲生、王撫洲、宋子文、霍寶樹等人，為上海、天津、廣州各區經濟管制督導員。

8 月 22 日，行莊復業，即中央銀行開始收兌金銀外幣的第一天，王雲五在南京辦公室接到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上海長途電話，言賀幣制改革政策成功，並稱「……其情形之踴躍，著實出乎他所預料之外」。從相關史料看，幣制改革一月內，全國物價，雖隨地而異，稍有漲落，但「大體仍甚良好」（王雲五語）。除少數商品，如紙煙類漲價外，其他日用生活物品，均有回落至 8 月 19 日水準以下，「最初四十日的反應可說良好」（吳相湘語）。

9 月 3 日，從美國訪問歸來的傅斯年致函王雲五：「此事關係國家之生存，非公之無既得利益者不足以為此，卓見毅力。我是向來好批評而甚少恭維人的，此次獨為例外。」傅同時勸說王雲五取消此次赴美開會計畫，或許認為王作為幣制改革主持人，在此關鍵時刻不容離開。後來事實證明，這一擔憂不無道理。「行政院臨時卻將收兌金鈔之期限延長，那時候，我正在美國開會，接到此項消息，至感奇異，但自延長之日起，即十月一日起，不僅求兌者寥寥無幾，而四十日之樂觀局面，也就從此突變……」王雲五事後感傷地說。



此時出現兩大現象：一，開始有黑市。對外匯價，下跌甚速，由原來的四比一，下跌至十比一，逐漸至二十比一。二，搶購風潮興起。其原因是：加強經濟管制，凍結物價，屬硬性規定，店家老闆，只得服從。「不久聰明人便搶先購買，寢假而大家參加搶購。先搶洋貨雜品，次及米糧麵食。最後只要手上有錢，無所不搶，社會秩序騷然……」（徐柏園語）10月11日，王雲五自美國會議歸來，認定此次搶購風潮，「至少在上海方面係有組織的舉動」。但對於更多民眾來說，其悵然與絕望，或不亞於戰亂帶來的紛擾與不幸。尤其是淪陷區民眾，持有的貨幣，九年之間三次重大變易，已等於烏有！「然而他們仍不怨不尤，搜查箱底找出少數收藏多年結婚金飾等遵令往兌成金圓券」。金圓券發行四十日內，以紙易金，兌得黃金美鈔逾三億元，可說是大多民眾將戰火劫餘全部奉獻，愛國心發揮盡致，但亦實屬被迫而徒喚奈何！

事實上，將金融市場攪亂非此時心如亂麻的小商人，真正是那些強勢的大資本家和大商人，赴滬實際主持經濟督導的蔣經國，在8月22日日記稱：自新經濟方案公佈之後，一般人民對於幣制的改革以及經濟的管制，多抱樂觀的心理；而政府人員則多抱懷疑的態度。……搗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蔣經國著《痛定思痛》，1955年12月臺北出版）；從郭廷以編著的《中國民國史事日誌》中亦可知其違規之況，如9月2日：洩露改革幣制消息乘機牟利之財政部秘書陶啟明（所謂在滬拋售紗股之隱名士）被拘……9月3日：申新紗廠總經理榮鴻元因私套港匯，證券經紀人杜維屏（杜月笙之第二子）因幣制改革前夕拋售永安紗股，被上海經濟管制督導員蔣經國扣押。10月

1日：宋美齡自京到滬（傳與上海揚子江公司囤積大批汽車鋼鐵棉紗案有關，該公司總經理為孔祥熙之子令侃）。

新幣發行前，蔣介石曾兩次諮詢前中央銀行總裁張公權。張直言相告：必須有充分現金準備或外匯儲備。或則控制每日發行額，較前減少，方可實行；若無充分現金準備，則至少也要把握物資，有力控制物價，使新幣不貶值。中央銀行副總裁劉攻芸在蔣召集的一次會上也說：此時改革幣制，對安定民心，未必能收宏效；因改革幣制要有充分的準備，我們目前的現金儲備，已愈用愈少！王雲五則說：我們有「關餘」，可充新幣之準備。劉反問：只剩下一個上海關了，還能收到多少？發行新幣，缺少現金準備，已違反貨幣學基本原理；即便如王雲五所說以「關餘」作準備，則仍需相當時日，「始可積存成數」。且關稅以關金為單位，抗戰時關金券已以二十對一法幣流行市面，等於變相發行大鈔。代收關稅的各外國銀行素來驕橫，抗戰八年中英關係每下愈況，若再指望英政府將如1935年推行法幣時予以支持，即將所有關稅以外匯撥交，「恐不十分可能」。凡此種種，王雲五事先理應周詳考慮，寧緩毋急，或多尋其他之方案。然上任後七十九天即斷然宣佈發行金圓券，「實在遠超過本人才能學識，以致愛國終致誤國」（吳相湘語）。

王雲五設法補救，擬方案兩種，翁文灝彷徨失措，不敢實行。10月16日，「經管會對兩案，特別是預結外匯一案，意見未能一致，遷延莫決，而金圓券日益貶值，一般物價惡化尤甚，……而若干地方已發生搶購糧食情事」（王雲五語）。10月29日，立法院主張取消限價；10月31日，行政院臨時會議通過《改善經濟管制補充辦法》，決定放棄物價限制，糧食依市價交易，自行運銷，



紗布、糖、煤、鹽其他日用品由政府核定示價……等於宣告幣改失敗。

11月3日，翁文灝內閣決定總辭；11月10日，王雲五引咎辭職，黯然離去。

11月11日，行政院宣佈《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同時頒佈《修正人民所存金銀外幣處理辦法》，准許民眾持有金銀外幣，准許銀幣流通，金圓券存款時得以金圓券同額兌換金銀，改訂金圓券兌換率，黃金每兩一千元，白銀每兩十五元，銀幣每元十元，美鈔每元二十元。其比率卻高於三個月前政府買進的五倍！此時人們對金融信心大跌，寧買黃金，而不要金圓券，「每日上海黃浦灘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門前，自清晨至傍晚，鵠立群眾擁擠不堪，現象十分惡劣，終於發生擠斃人命」（張公權語）。

「發行不到三個月的金圓券完全失敗，前此以金銀外幣兌換金圓券的守法良民為之破產，怨聲載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潰」（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接著，平津失守，中原會戰失敗，軍事逆轉，互為因果，通貨進一步膨脹，至11月，金圓券總額突破原限二十億；至次年5月，上海撤守，發行總額已上漲了63900餘倍，幾成廢紙。

四

有學者提出「金圓券是大陸沉淪主因」（沈雲龍語），或許是從政策與民心的「得與失」來加來解讀的。以其所造成的嚴重後果看，未必過分之言。

不過，對當事人王雲五來說，在此金圓券背後，仍有許多難言之隱。至少，其結局與初衷相悖，而始料未及。1967年前後，

王近八十高齡，撰著「八十自述」，其中涉及「金圓券」三章，交友人阮毅成「核定」。阮針對文中未盡之言，多有疑問；王一一作答，坦誠無遮，甚至「是非功罪不願一辯」，或不失其磊落。

阮問：外間均謂我抗戰勝利之時，國庫有外匯七億元美金。

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長，一年餘即揮霍殆盡，因而通貨膨脹，幣制遂被迫不得不加改革……

王答：當時確有七億元美金，亦確為宋子文用光……

阮問：幣制改革案，中央早有擬議，迄未定案，因無人敢負如此重大責任，而於先生接長財政部後，斷然提出。並有人謂係奉命提出，終於造成重大風潮，甚至大陸撤守，此亦被指為重要原因。因而先生係屬代人受過，究竟真相如何？

王答：一、中央確有數種幣制改革草案，但均不成熟。本人到財政部後，一一取閱，曾有所參考。金圓券辦法，係本人獨創，並無人授意。惟事先報告中央時，曾說明此須軍事上有把握，方能實施。否則軍費無限制開支，而失地日多，人心動搖，即斷不能辦幣制改革。而軍方首長，皆謂軍事絕對有把握，並可於幾個月內，即可將北方肅清，於是方敢放手做去。不料十月初，濟南即告撤守。而東北駐軍竟自印鈔票，幣信遂告下跌，終至無法挽回。所謂代人受過，本人從未敢以此作推諉之藉口也……二、中央當時有鑒於通貨膨脹之危險，急求改革幣制。初意能得美援幫助，而美國竟袖手不理……



阮問：先生當時主張統一各省地方貨幣。尤其是東北幣與台幣，但為人在審查小組中反對，致未能徹底實現。反對者係何人？

王答：反對最力者，係臺灣省政府。但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嚴靜波先生，在台改革新臺幣，其構想與前一年本人之辦法相同。嚴之所以成功，乃由於臺灣軍事安定。而陳辭修（陳誠）先生之堅毅，又遠非翁文灝所可及。

阮問：先生當時主張封存京滬各大都市銀行之保管箱，在審查小組中，遭受堅決反對，致未能實行。反對者係何人？

王答：反對最力者，係俞鴻鈞。

阮問：先生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底，赴美國開會，是否當時可以不去？

王答：係因是年國際貨幣基金會，輪值我國主席。我前往出席，乃是希望在美援未恢復前，先能在基金會曾謀求貸款。行前將一切補充辦法，親自擬就，送交翁文灝。而翁膽小，竟聽信俞鴻鈞之言，謂上海工商界要求收兌金鈔，延期一個月截止，予以同意。俞鴻鈞時任中央銀行總裁，在上海辦公。俞又曾在戰前，任上海市長，自易受上海工商界甚至幫會人士之包圍。本人當時如在國內，或翁肯有負責任，即不致有此失敗。

阮問：先生主張糧食限價，而有人反對，堅持自由買賣。糧價一經放鬆，其他物價乃皆無法管制，此亦為導致